

生态史学视野下的 十六国北魏兴衰

张敏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生态史学视野下的 十六国北魏兴衰

张其成 著



中华书局出版

1230.7/7

SHENGTAISHIXUESHIYEXIADESHILIGUOBEIWEIXINGSHUAI

生态史学视野下的 十六国北魏兴衰

张敏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史学视野下的十六国北魏兴衰/张敏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11

ISBN 7-216-04115-1

I. 生…

II. 张…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五胡十六国时代

②中国—古代史—研究—北魏(439~534)

IV. K2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111 号

生态史学视野下的十六国北魏兴衰

张 敏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大学印刷厂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92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8.375
插页:1

版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数:1-1 000

印次: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书号:ISBN 7-216-04115-1/K·411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张敏博士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师从阎守诚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史。近年来加盟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习勤奋努力,工作踏实肯干,待人谦和诚恳,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荣获湖北大学第五届“十佳青年教师”称号。在完成重要的教学任务和繁琐的教研室主任工作的前提下,科研亦有长足进展。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专著《生态史学视野下的十六国北魏兴衰》即是明证。此书粗读一遍,便觉耳目一新。

一是视角新颖。该书以生态史学为理论资源,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这个角度来审视十六国和北魏兴衰的深层动因,试图揭示生态环境与政权兴衰之间复杂多变的互动关系,这对我们今天深入理解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观念的科学发展观极有裨益。众所周知,上世纪5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生态史学的兴起,不过是近数十年的事,然而作者已能运用得比较得心应手。我们亦由此可见作者思维之敏捷、视野之开阔,以及作者对理论素养的极端重视和孜孜追求。

二是资料翔实。史界公认,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和动荡的一个时期,史料亦不甚丰富,研究起来,不免令人望而生畏。然而本书作者不畏繁难,从“前四史”到“南、北史”,从《晋

书》、《魏书》、《北齐书》到《隋书》、《资治通鉴》均有涉猎,同时还运用了《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的资料,还有不少考古资料亦成为该书论点的重要支撑。这就将生态史学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史料中,确实难能可贵。

三是学风纯正,尊重学界成果。生态史学的兴起虽是晚近的事,但对历史时期气候、环境、河流、湖泊、森林、草原、沙漠等等的研究却都是由来已久。就我国学术界而言,南有谭其骧,北有史念海等前辈大师,科技界还有以竺可桢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我们看到,作者认真梳理了两个学科的大量文献,认真汲取学界成果作为自己的学术营养;同时又能融会贯通,将之与当时的历史实际和本书论题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结论。

四是现实感强。作者十分关注当今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提出“古今贯通,以古鉴今”的原则,用历史经验来加深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双向互动关系的认识,又用今天的经验来加深我们对历史时期的认识。故而此书具有当代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读来一点也不觉得枯燥。

本人于魏晋南北朝史是外行,对此书获致的不少崭新认识不敢妄加评论。但仅凭上述几点而言,已可断言此书之创新必有坚实的基础。好在此书即将面世,相信学术界定会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

葛金芳

2004年9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和指导理论	(2)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和本书的学术构想	(10)
第二章 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	(22)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寒冷干燥期的出现与少数民族的内迁	(23)
一、魏晋南北朝寒冷干燥期的出现	(23)
1. 魏晋南北朝气候大变迁	(25)
2. 生物环境的巨大变化	(35)
二、游牧民族内迁的进程	(39)
第二节 3 世纪晚期至 4 世纪初期旱灾频发期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45)
一、旱灾频发期的出现	(46)
二、旱灾频发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51)

第三章 北魏时期农牧关系与社会基层组织的演变	(55)
第一节 农牧关系的调整 and 变化	(57)
一、十六国时期农牧关系的变化	(64)
二、北魏农耕业的发展	(72)
三、农牧混合经济的成功	(89)
第二节 北魏政权对坞壁组织的改造和融合	(94)
一、十六国时期的坞壁	(96)
二、从宗主督护制到三长制和均田制	(105)
第四章 自然灾害与北魏的兼并战争	(116)
第一节 自然灾害与北魏后勤保障制度	(117)
一、冷冻灾害与军服保障	(118)
二、疫病与医疗抚恤保障	(126)
1. 疫病与医疗制度	(126)
2. 抚恤制度	(130)
三、饥馑与军粮草保障	(141)
1. 抢掠民粮和因粮于敌	(143)
2. 仓储系统	(145)
3. 屯田	(151)
第二节 天时和水旱灾害对南北朝战争的影响	(157)
一、北魏对天时的利用	(157)
二、南朝以水代兵的战略	(161)
第五章 北魏长城—军镇防御体系对环境的影响及其 后果	(171)
第一节 长城—军镇防御体系的建立	(172)

一、柔然的崛起和修筑长城的决策	(172)
二、长城—军镇防御体系的设置	(186)
第二节 长城—军镇防御体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189)
一、北魏军镇的农垦活动	(191)
二、农垦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198)
三、从边镇地区生物环境和沙漠的变迁看自然环境的 恶化	(209)
第三节 长城—军镇体系的崩溃和北魏政权的灭亡	(216)
一、北魏军镇吏治及赈灾状况	(217)
二、天灾人祸引发六镇起义	(228)
余 论	(235)
主要参考文献	(239)
后 记	(260)

第一章 绪论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全球性的人口、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口膨胀、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已构成极大威胁。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个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新的形势下重新以更尖锐的方式提了出来。协调人类社会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而从生态环境背景出发,重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因素,也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在欧美,生态史学研究大体上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 60 年代谭其骧先生《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 年第 2 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

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 90 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本书围绕十六国至北魏时期自然环境变迁与历史进程的互动关系这一主题,探讨了人

类发展与环境变迁的一些关系,力图为我国生态史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和指导理论

长期以来,历史都完全被看作是人的历史。尽管自达尔文开始,自然的进化被当作了一个过程,从而使自然也有了历史,而且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的事实,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家所承认。但是,长期以来,人类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仍然是被割裂开来的。20世纪60、70年代,生态史学应运而生,并最终使自然和人类历史两个方面汇入到一条长河之中。

生态史学的要义是说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事关系,从而使生态史学与其他历史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有了差别。尽管不同学者对生态史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有不同理解,但无论哪一种看法,都跳出了传统史学以政治史或民族—国家史为研究核心的束缚。并且,生态史学的研究领域无疑要比先前的各种历史学科都要宽广,它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从而打开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同时,从事生态史学研究的学者一般都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成果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生态史研究既涉及人类社会,又关系到自然环境,就其性质来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这就决定了生态史的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手段。生态史研究必须充分利

用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相关学科相配合,相互借鉴。这些相关的学科很多,包括地质学、地理学、水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生态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等。其中,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尤显重要。跨学科的研究能有效地克服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单一、技术手段陈旧的弊端,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人类与自然环境永远是互为制约、相互作用的,二者之间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人类对自然的作用愈强烈,自然对人类的反作用就越显著。当然,自然的反作用可能与人类的作用同时发生,也可能滞后于人类的作用。而且,自然的反作用可能发生在与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同一区域内,也可能易地发生,或在更大更广的区域内发生。可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呈现着复杂多变的特点。当前科学界对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认识正在加深,但是面对环境变化,人类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如何调整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却是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领域。因此,以人与环境适应这一角度认识人地关系的互动特征,探讨有史以来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动态关系,是当前科学研究提出的新课题。

中国有着 5000 年的悠久文明史,而且又有着重视历史的传统,仅留存下来的历史典籍就浩如烟海,其中蕴藏的环境史料相当丰富,自然异常和灾变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等内容兼备,时间系列长而且连续性、综合性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这是世界各大文明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限于时间和学力,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这 5000 年历史中人地互动的发展历程都在本书中加以探讨和阐释。而如能将其中一段讨论清楚,那也必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和动荡的时期”^①。统一的汉帝国的崩溃造成了延续近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而西晋短暂的统一局面又很快被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所打破,北方的游牧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建立民族政权,彼此攻伐,最后由拓跋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与汉族政权南北对峙。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重要转折,民族关系和政局发生了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尊王攘夷以来最大的变化。古今学者早已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和阐述。然而,我们注意到很少有人结合当时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来研究这一变化的原因和进程。

所谓自然环境,又称地理环境,是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各自然要素,如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矿藏和生物等^②。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不同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不仅影响着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而且还影响着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方针政策,从而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鉴于此,我们从十六国割据局面的出现和北魏政权兴衰,这两者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角度,来对魏晋南北朝历史进程进行新的诠释。

我们认为:东汉末年以来自然环境变迁是十六国割据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而3世纪晚期至4世纪初期出现的旱灾频发期,给西晋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加速了它崩溃的进程。公元4世

① 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页。

② 《地理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78页。

纪末,当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的时候,中国北方正处在十六国分割割据的大动乱中,北魏也只是其中一个偏居一隅、力量并不很大的小国。然而北魏政权能够扫平群雄,统一北方,除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取得成效之外,其适应魏晋以来自然环境的巨大变迁,执行比较符合实际的政策,国力强盛起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之后,统一的局面仅仅持续了不到 100 年的时间,黄河流域又重新陷入战乱之中。这其中,北魏政权没有解决好北方军镇的生态问题,应对失误,无疑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重点考察了自然环境变迁对社会经济、战争和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北魏政权为适应这一变迁而采取的政策及其后果,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魏晋南北朝乃至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同时,也能为我们探索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规律,为我国当代减灾防灾,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因而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既要反对地理虚无主义和唯意志论,又要反对环境决定论。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条件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之一。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历史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基本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

在历史进程中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任何的研究就无从谈起。片面强调人类社会对于环境的影响和优化作用,就会走向文化决定论。

其次,我们必须反对唯心主义的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者过分夸大了地理环境条件的作用,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人文现象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的支配,把地理环境看作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因素了。

在西方,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社会之影响的解释,早在古典时代就开始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等人做了最初的阐述。近代以来,法国学者博丹提出了更为详备的地理史观,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有关理论的产生。孟氏从论证法律与气候和土壤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地形、土壤等与国家政体、法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既有合理的,也有荒谬的。孟德斯鸠认为,寒冷的气候使人坦率诚实,精力充沛,勇敢而有信心,人们这样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造成了自由的政体。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则颓唐懒惰,胆怯无力,完全被动,这使他们成为奴隶。他还认为土地的肥瘠情况也影响到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土地肥沃使人养成一种依赖性,贪生怕死,易屈服于强者而不那么渴望自由,因而产生了专制制度;土地瘠薄则使人勤勉持重,坚忍耐劳,勇敢善战。他甚至认为人们居住的地理位置(山区、平原或海岛)也对人们的气质性格产生影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响^①。而在所有这些地理环境因素中,“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②。

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指出“地理的基础”与“各民族在世界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并以全球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用,认为温带比寒带和热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黑格尔还把地形条件分为“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大河大江流过的平原流域”以及“与大海相联接的海岸区域”这三类,认为它们分别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业民族的故乡和航海与商业民族的祖国^③。

正如经典作家所指出的那样,地理环境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表现在它能够“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④。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⑤。人是主动的,是环境变化的作用者。恩格斯指出:“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⑥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的韩茂莉女士进一步阐释了人与环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燕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7~282页。

②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燕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1页。

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

④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版,第19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

境适应的关系：“在地球系统中，人类不是全球变化的观察者，而是这个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与自然系统不同的是，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即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变化。人类活动既参与了环境变化进程，同时也在变化的环境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所谓人与环境适应即指人类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调整自己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行为，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响应。”^①

不同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遇到的自然环境各不相同，是导致各民族历史进程多样性的重要原因；但各个民族都要在既定的自然环境里通过实践活动逐渐提高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能力，使自己从客观限定性中获得自由的程度不断增长。具体到十六国北魏时期，当时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和政治集团，在政治军事制度、治国思想和方法上进行尝试和选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加强实力，进而吞并对手，甚至统一中原。在这些尝试和选择的过程中，由于拓跋鲜卑是内迁诸族中入塞较晚的一支，因此，北魏政权能够总结此前胡族政权的统治经验和教训，推行比较正确的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从而增强了国力，脱颖而出，扫平群雄，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始终保持着对南方汉族政权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不仅仅是依靠了铁骑锐卒的武功，更主要的是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方针的结果。而它之走向衰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由于政策失误从而导致人地关系恶化，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六镇起义。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特别要注意战争与灾害的关

^① 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地理研究》2000年第3期。